

# 近現代報刊傳媒與戰前新馬漢詩

王 兵

## 提 要

在 1881 年《叻報》創辦之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漢詩創作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而在《叻報》創立至 1941 年底新馬淪陷前的 60 年間，新馬中文報紙的發展異常迅猛，陸續誕生的報紙計有《檳城新報》、《星報》、《天南新報》、《日新報》、《總匯新報》、《中興日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二十餘種。這些華文報紙，幾乎每一種都定期或不定期地登載舊體詩。因此，華文報刊的定位、副刊主編的喜好等也會影響到新馬漢詩的發展。同時，新馬地區這一時期出現的“新派詩”亦可視為這一傳播載體影響下的產物。另外，就華文報刊對於傳統漢詩發展的意義而言，近現代華文報刊登載漢詩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提供傳播渠道和保存原始史料，更為深層的價值在於詩人的創作成果從“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空間”，從而實現向廣大讀者傳達審美欣賞、文化再現和社會政治參與等層面的價值。

**關鍵詞：**漢詩；華文報刊；新馬；公共空間；新派詩

“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sup>1</sup> 這則極具歷史眼光的預言，道出了現代報刊對於文學文體變革的重要影響。不過據陳平原的論述，很長一段時

---

1 梁啟超：《中國各報存佚表》，《清議報》第 100 期，1901 年 12 月 21 日。

間內中國文學史家並沒有認識到大眾傳媒對於文學進程的影響力。如1922年胡適為《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刊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過於迷戀自家的“文白”與“死活”說，而忽略了僅在眼前的《申報》；1929年陳子展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論述“文學革命”興起的諸多原因，也忽略了報刊出現的意義。<sup>2</sup> 而幸運的是，新馬華文文學史的研究者則非常重視本地報刊中登載的文學作品和其他文學史料。方修、黃孟文、王潤華的文學史著作皆是如此。甚至於方桂香的《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則直接以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文藝”、“文叢”、“咖啡座”、“窗”和馬來西亞文學雜誌《蕉風月刊》為例進行個案研究。<sup>3</sup> 在舊體文學方面，李慶年的專著則完全使用早期華文報紙中的舊體詩資料來梳理1881—1941馬來亞華人舊體詩的演進史。<sup>4</sup> 報刊的文藝副刊也有專門研究，1980年楊松年和周維介合作出版的《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即概論文藝副刊對於文學的影響，兼顧現代文學和舊體文學。<sup>5</sup>

美國英語教育學者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曾經用一個三角形的模式構建了文學的基本結構，這個結構組合了文學的四要素：世界、藝術家、欣賞者和作品，建立起文學研究的基本框架；<sup>6</sup> 其後，華裔學者劉若愚曾對這個結構圖示進行了改進，通過四個要素構成的循環模式建立一個回環有機的文學審美系統。<sup>7</sup> 如今這兩種類似的文學結構圖示皆面臨著重組的必要，因為媒介在文學活動中的位置和作用必須予以高度重視。這裏所言的傳播媒介可以是早期的口語、文字和印刷書籍，也可以是後期的報刊、影視和網絡等。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很難直觀地用模式圖把媒介在文學中的角色清晰地表達出

2 陳平原、山口守：《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陳平原《序》，頁1。

3 方桂香，《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新加坡：創意圈出版社，2010年）。

4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5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年）。

6 參見M. H. 艾布拉姆斯著，鄺稚牛等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7 參見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來，因為媒介不僅僅表現為其中一個因素或一個動因，它既在世界、作家、文本和讀者構成的循環之內，又在這個循環之外；它既處在文學循環的中心，又構成文學活動的背景；它是潛在的作家和讀者變成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和讀者，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媒介創造了作家和讀者；它是文本的載體，同時它也將作家創作的文本變為進入流通環節的作品。總之，媒介不僅用自身的形態特性和傳播傾向制約著我們接受信息的方式，影響著傳播內容，而且還影響到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到社會文化。當然，在探討媒介對於文學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媒體人的價值，其政治傾向、藝術偏好等都會對文學創作、流播和批評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即重點論述早期華文報刊及媒體人在新馬漢詩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新馬漢詩在這一傳播語境下的價值評估。探討的時間段即以《叻報》創刊的 1881 年為發端，至新馬淪陷前的 1941 年底截止，亦即新馬文學史統稱的“戰前時期”。本文所稱之漢詩意指中國以外用漢語和傳統格律創作的古近體詩。

## 一、媒體定位、副刊主編取向與漢詩的發展

誠如李慶年所言：“馬華舊體詩的研究資料幾乎全都出自新、馬的中文報紙。在報紙還沒問世之前，即使有人詩作累篇，也往往無法付梓刊行，因此許多作品就難以流傳下來。”<sup>8</sup> 換言之，在 1881 年《叻報》創辦之前，新馬地區的漢詩創作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而在《叻報》創立至 1941 年底的 60 年間，新馬華文報紙的發展異常迅猛，陸續誕生的報紙有《星報》、《檳城新報》、《天南新報》、《日新報》、《總匯新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光華日報》、《南洋時報》、《南僑日報》、《振南報》、《益群日報》、《國民日報》、《新國民日報》、《新益群報》、《南鐸日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中南晨報》、《民國日報》與《星中日報》。在上述華文報紙中，每一種都登載有舊體詩，有些是定期刊登，有些甚至每天都載，數量之多，可以想見。與 20 世紀初的中國報刊相比，同時

---

<sup>8</sup>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7。

期的新馬報刊,較少刊載白話新文學,基本全是舊體文學的陣地。難怪中國評論者在探討境外的新文學革命時,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在南洋地區,面對著強大的華文舊文學、文言文學、鴛鴦蝴蝶派小說等等對手,白話新文學往往因其藝術表現的幼稚、藝術水准的低下而敗在舊文學營壘的筆下,而失去了大批熱心的讀者,不能像國內的新文學那樣很快地佔據文壇的主導地位。”<sup>9</sup>這也反觀出當時南洋包括漢詩在內的華文舊體文學的興盛。

20世紀之前的華文報紙如《叻報》、《星報》和《檳城新報》等,還沒有固定的舊體詩欄目或版位,舊體詩竟然和新聞報道同列。隨著副刊的不斷出現,舊體詩才逐漸在諸家報刊中尋覓到了相對固定的登載位置,直至有的報紙還出版全部刊登舊體詩的刊物。茲參考李慶年、楊松年等人的研究成果,將戰前新馬華文報刊中登載舊體詩的副刊欄目進行粗略統計,<sup>10</sup>彙成下表:

報刊名稱	起訖時間	副刊或欄目名稱	投稿社團和作家	總編輯或副刊編輯
叻報	1881.12— 1932.03	叻報附張·文苑;文藝欄;叻報俱樂部·詩界;椰林;閒暇等	檀社、星洲三山吟社 II、葉季允等	葉季允、周君南、陳煉青
星報	1890.02— 1898.08	詩稿附登;詩章附錄;詩章就正等	圖南社、會吟社、麗澤社、邱菽園等	蕭慶祺、何應源
檳城新報	1895.08— 1941.09	益智錄·詞苑;益智錄·詩界;益智錄·詞章;文苑;詩詞專號;無綫電臺;大千世界;東方花園等	郁達夫、曾夢筆、郭碧峰、陳修禮等	曾覺民、湯明午、曾夢筆
天南新報	1898.05— 1905.04	外人來稿;來詩類錄;雜著附刊;詞人妙翰等	邱菽園、秦力山、丘逢甲、陳寶琛、王恩翔、潘飛聲、蕭雅堂等	邱菽園、徐季鈞、林鴻蓀、黃世仲、黃伯耀

9 李志:《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學術研究》,2002年第10期,頁109。

10 《中南晨報》(1930.02—1930.09)和《新益群報》(1935.08—1936.09)因存活時間太短,登載舊體詩作數量非常有限,故從略。

11 1927年1月,顏怡園、江希志、黃鳴岐、林勞塵、倪劍鳴、葛復生等人創立星洲三山吟社,以“叻報俱樂部”為發表園地,偏好抒發幽情逸興之作。

## 續表

報刊名稱	起訖時間	副刊或欄目名稱	投稿社團和作家	總編輯或副刊編輯
中興日報	1907.08— 1910.02	非非·詞林;文苑等	同盟會成員	王斧、田桐
總匯新報	1908.06— 1941.09	文苑;詩界;詩選;詩叢; 詩壇;工餘讀者;總匯副 刊;社會花絮;金馬侖高 原;星期副刊;日落;世 紀風等	麻坡天南吟社、劉思、 郁華、劉楚材、陳修 禮等	邱菽園、邱宗尼、黃 玉垣
星洲晨報	1909.08— 1910.11	警夢鐘·詞苑等	吳之漢、劉漢全等	周佛寶、謝心准
光華日報	1910.12— 1941.12	光華雜誌;帆聲;孔明; 朝霞;頑石;檳語;檳榔; 光華;國學;愛逸意談; 星期副刊;燦爛等	阮湘、饒百迎、曾夢 筆、陳修禮、管震民等	文子慧、阮湘、曾夢 筆、李少嶽、黃鳳翔
南僑日報	1911.10— 1914.03	文苑等	革命黨人、南社	黃吉辰、盧耀堂
振南報	1913.01— 1920.09	文苑;詩界;海天酬唱等	邱菽園、王君俠、黎伯 概、卓六銘等	邱菽園
國民日報	1914.05— 1919.06	國民俱樂部·文苑;詩 苑;詩選;詩詞等	朱梁任、成舍我、吳鈍 民、吳炎漢、黎伯概、 南社等	雷鐵崖、姚鵬雛
益群日報	1919.03— 1934.11	蕊珠宮;詩選;晨光;天 籟之聲;學海;文藻;晨 鍾;益群雜誌;南風等	曾青蘋、黎耀聰、梁春 雷、何心谷、范景星等	吳鈍民、曾心影等
新國民日報	1919.10— 1940.12	新國民雜誌·詩界;詩 歌世界;雪花;涓涓;華 僑公園;新園地等	廖舜臣、嘯崖、恒升、 歎生、黃藻泮、李鐵 民、張叔耐等	張叔耐、邱菽園
南洋時報	1922.06— 1930.04	荔;海絲;詩;微光;同 善;八月;國學等	陳誦堯、曾夢筆、郭碧 峰、駱世生、曹香芝等	陳晴山、陳舊燕
南鐸日報	1923.05— 1925.04	黎明;讀者俱樂部等	檀社、邱菽園、李伯 銘、李樂天等	邱菽園
南洋商報	1923.09— 1941.12 1945.09— 1983.03	商餘雜誌;獅聲;曉風; 吟哦臺等	檀社、天南吟社、黃和 衷、范自白、黃伯君、 李漢修、洪來儀、謝文 華、王春華、劉思等	邱菽園

續 表

報刊名稱	起訖時間	副刊或欄目名稱	投稿社團和作家	總編輯或副刊編輯
星洲日報	1929.01— 1941.12 1945.09— 1983.03.12	繁星;遊藝場等	隨安老人、邱菽園、李西浪、飄泊生、猿公、郁達夫、黃孟圭、劉楚材、招觀海、謝雲聲等	李夢仙、邱菽園、林健庵、郁達夫
民國日報	1930.01— 1934.10	公共園地;南荒;1933; 1934;佳妃座談等	玖永、滂音、吳蕭、斗牛等	馬康人、馬蝶影、周靜稚
星中日報	1935.09— 1940.04	星海;星雲;星字等	郁達夫、李西浪、姚楚英、黃志鴻、太虛等	胡守愚、鍾介民、胡邁

這個簡表大致勾勒出早期新馬漢詩的存在樣態,以及對於華文報刊的依賴程度。也因如此,早期漢詩的發展不僅取決於詩人自身的水平和努力,還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報紙定位、主編傾向或喜好的影響。一般而言,“詩稿照登”、“來詩照刊”的情況只會出現在報紙誕生之初。隨著創作者數量的增加,報紙副刊欄目創設的成熟,那些報刊或主編自然就會選擇既符合報社之總體定位、營銷策略,又合乎個人之偏好的詩作,這些無疑會影響到新加坡早期漢詩的發展。另外,報紙創辦人或主筆、主編的政治傾向也很重要。

李慶年在論述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馬華舊體詩(1901—1911)和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馬華舊體詩(1912—1926)時,按照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分別將當時登載漢詩的報紙歸入守舊(或立憲派、保皇派、維新派)與開明(或共和派、革命派)兩大類。前者如《叻報》、《檳城新報》、《總匯新報》、《振南報》和《南鐸日報》,最為典型的特徵是維護舊時代和舊事物,反對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後者如《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國民日報》、《益群日報》、《新國民日報》和《南洋商報》等,其共同特徵是反對帝制和封建思想,支持新事物、新文化。這些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報紙不僅在言論、新聞版面有充分體現,而且在看似疏離政治的文藝副刊中也隱約可見。

12 1983年初,在新加坡的《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合併,並以《聯合早報》與《聯合晚報》的名字出版。新加坡《星洲日報》宣告結束。

## 1. 詩歌作者的選擇

一般而言，報紙副刊應該自由開放給所有喜歡文藝創作的作者，但在實際操作中，主編對於投稿人及其作品還是有選擇的權力。其考量的因素主要有幾個方面：詩社社友、與主編有文字唱酬的詩友、與報紙總體傾向接近類似之作者以及作品內容或風格深得主編賞識之人。

早期由左秉隆、黃遵憲、邱菽園等創辦的文學社團，其課題、課榜以及獲獎作品都在報上刊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 19 世紀末的詩人數量有限，詩歌作品主要來自於詩社社課，因此《叻報》、《星報》等早期報紙若要開辟文藝專欄，必須仰賴會賢社、會吟社、圖南社及麗澤社的支持；另一方面，上述社團的創辦者要麼是晚清駐新加坡的領事官，要麼是所在地華族的文化名人，他們和《叻報》、《星報》等皆有密切的聯繫，因此這些早期華文報紙也樂意刊登諸家詩社的作品。迨至 1897 年 2 月，邱菽園發起了客雲廬徵詩活動（客雲廬乃邱菽園位於新加坡河畔用來接待外來詩友的屋名，康有為 1900 年 2 月即寓居此處）。這一活動引起了外地詩友丘逢甲、王恩翔、潘飛聲等名家的興趣，也得到了寓居本地的黎經、林筠臺、謝靜希、林鴻蓀等人的支持。諸家詩作原擬編刻成集，以冀廣播，<sup>13</sup>最終沒有實現，反而陸續被刊登在《天南新報》之“雜著附刊”專欄，且標明“客雲廬詩略”、“客雲廬詩徵”等抬頭。這項活動雖然以星洲樂群文社為名，但所徵對象早已逾越文社社員之範圍，顯然具有將天下名家名作歸入麾下之企圖。

不過，這種廣泛徵詩的做法也顯示出邱菽園對於詩人的選擇並無特殊偏好，秉承相對開放包容的態度。他曾說過：“編輯詩者往往略於古人而詳於今人，嚴於古人而寬於今人。蓋古人多屬已傳，雖不稱述，世亦自能稔習；今人尚待論定，苟非臚列，後將毋以覽觀。”<sup>14</sup>實際操作也的確如此。邱氏在其獨資創辦的《天南新報》中，除了大量刊載自己的詩作、詩評和友人的詩作，也設置“外人來稿”、“來詩照刊”等欄目吸引或認識或不認識的各方先進踴躍投稿。若以

<sup>13</sup> 邱菽園：《客雲廬詩錄發凡》，《星報》，1897 年 12 月 9 日。

<sup>14</sup>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廣州：邱氏刊印本，1899），卷六，頁 28 下。

1899年10月創刊的《日新報》相較，區別更爲明顯。因爲《日新報》對於外稿（自由投稿）者非常謹慎，其“投稿標準”明言：“外來論說、新聞，以及詩詞、歌賦，務求有益於世，無損於人者，方敢照登以副盛意。但來稿務須寫明真實姓名、爵里，而後敢登。”<sup>15</sup>正因爲如此嚴苛的選擇標準，該報在將近三年的存活時間裏，惟有三首轉載自中國的作品。如此看來，用漢詩編織一個由南洋與晚清詩人群所組成的交際網絡，是邱菽園成爲在地文化領袖的重要原因。

當然，並非所有的報紙創辦者或主編都如此開明，尤其是那些政治傾向強烈的報刊，一般只會登載部分志同道合者的詩作。如《總匯新報》在辛亥革命前的三年間，大量刊登康有爲、梁啟超及其追隨者的詩作，而同一時間的《中興日報》則集中刊登了一些同盟會成員及其同情革命的詩人的作品。有些副刊主編在選擇詩歌作者時，帶有明顯的個人傾向。如1912年負責《檳城新報》副刊的主編曾覺民就是一個沈湎酒色而又風流自賞的舊式文人，他有不少贈妓詩，對投來的同類作品特具好感。因此，在他編輯之下，舊體詩只能在傷時寫景、賦唱贈別的圈子裏打轉，對於其時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多少反映。1920年，《檳城新報》副刊主編改由湯明午負責，這也是一個思想守舊、專門與革命黨人爲敵的編輯。在他主持之下，該報副刊經常刊登反對孫中山、反對國民黨的作品。此外，多數主編喜歡選用周圍許多朋友的作品。如郁達夫在主編《星洲日報》“繁星”版時，大量選用黃孟圭、李西浪、謝雲聲、黎伯概、徐悲鴻、劉楚材、曾夢筆、陳延謙等好友的作品。

## 2. 詩歌題材的偏好

傳統漢詩的題材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常見的有寫景抒情詩、詠物言志詩、即事感懷詩、懷古詠史詩、邊塞征戰詩、羈旅行役詩等。總體而言，新馬早期漢詩偏好酬贈、寫景、思鄉、詠懷等。

酬贈詩是新馬漢詩數量最多的一種詩歌題材，充分地展示出早期寓居南洋的文人和中國文人的雙向互動。當然，在地文人之間的唱酬也非常頻密，尤其是詩社社友之間的文字往來。早期報紙的副刊編輯若亦擅長舊體詩創作，

---

15 《本報更始告白》，《日新報》，1899年10月5日。

如葉季允、邱菽園之流，那麼該報副刊登載這類詩歌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主編本人也需要和支持該欄目的作者們保持密切的聯繫，而酬贈詩就是最好的溝通方式。如《叻報》主編葉季允留下詩作並不多，除卻《憶梅》<sup>81</sup>首之外，幾乎都是酬贈詩。常熟名士衛鑄生應左秉隆之邀南來遊歷，在新加坡前後四個月期間，分別和左秉隆、葉季允、李清輝、黃淵如、吳俊等人以詩唱和，所有詩作皆登載於《叻報》。郁達夫主編的《星洲日報》副刊“繁星”，所選亦多為贈題之作。據李慶年統計，自1938年11月25日至1941年8月11日，“繁星”刊載的單單與郁達夫有關的酬贈詩就有66首，因此李慶年對此評價說：“他在新加坡三年的詩是不如文的。在這段時期裏，他對詩所持的態度是把它當作日常生活中的應酬工具，而不是作為抗戰的武器。”而且提議研究郁達夫的學者“應該注意他往來交際的對象，從而認識他的日常活動。”<sup>16</sup>

寫景和思鄉也是多數報紙副刊經常登載的一種詩歌題材。早期南來文人面對與家鄉迥異的熱帶海島風光，自然會歌詠一番，然而一段時間的寓居之後，思鄉懷人之感便會油然而生。外來勞工即便願出苦力，剛到以工商為主的新加坡，謀生也不容易，何況那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文化人呢？於是在早期的報紙副刊中，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南來文人發表的寫景詩多發生在初到新加坡時看到的風景或已完全適應了在地生活後的遊歷，而思鄉詩多發生在寓居新加坡一段時間後難以適應在地生活、人生失意之時。如羅炳南發表在《叻報》的《登竹篙山》二律，前有小序云：“此山是叻埠王家之山也，距叻二十餘里，層巒聳翠，上山重霄，而其路能容駟馬迴環挨行。至登絕頂，亦甚平坦，有數人處於其間，以種竹蒔花為事。又建有三層巍樓……步其樓頂，遐瞻遠矚，覺通埠之山川河海，別開一幅畫圖。”竹篙山位於現在新加坡的福康寧公園境內，海拔高度只有60米，但在詩人眼中卻是“海外奇峰毓秀靈”。<sup>17</sup> 早期漢詩的寫景詩最大的特色就是南洋風光的描繪，不過單純描繪景物的詩詞並不多見，絕大多數的詩歌則將寫景、感懷和思鄉融合在一起，借景抒情。如曾任《天南

16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522—525。

17 《叻報》，1890年2月13日。

新報》主筆的黃伯耀在秋日登高時面對“刷目金風拍海來”的海邊秋景時，就吟歎出“一身去國五千里，回首家鄉朝漢臺”的思念。<sup>18</sup> 即使如曾任《益群報》副刊編輯的吳鈍民之《蘇丹橋晚眺》：“白楊片片舞風狂，晚景晴江一葦航。極目蘇丹橋上望，芭蕉椰樹戰斜陽。”<sup>19</sup> 看似全為寫景，實則宣揚在逆境中力挽狂瀾的戰鬥精神。

詠懷詩在早期報刊中大量出現，是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的。自晚清國勢衰微、時局動蕩，民國運動紛起、黨派紛爭，至遭受侵略，家國淪陷，諸種時事皆在早期南洋報紙之新聞版面有所報道，而那些關注祖國命運的新馬華僑詩人使用詩歌的形式來感時抒懷，寄托抱負。當時，這些寓居文人獲得消息的渠道只有兩種：過境文人的轉述和報紙的新聞報道。這就決定了新加坡早期漢詩中的詠懷詩，除卻有關新馬的事件之外，都不是作者親歷事件之後的抒懷，而對某些事件的解讀則過分仰賴媒體和友人的評析，因此多數詠懷詩抒發的情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陳述事件時多籠統言之，細節描述較少。就抒懷方式而言，這一類的舊體詩歌也分為即事感懷和詠史抒懷兩種。前者多直接抒情，後者乃間接抒情。總體而言，這兩類詩在各家報刊都有登載，只是涉及某些與政治有關的事件時，不同政治傾向的報刊就會有不同的反應，其副刊登載的同主題詩歌的數量和性質就會有很大的差別。以 1898 年“戊戌六君子”被害至 1900 年光緒帝退位為例，《天南新報》刊登了數十首即事感懷詩，其原因是這一時期的流寓詩人多屬保皇黨人，鼓吹維新變法和宣揚保皇思想的邱菽園自然會同情他們，進而較多刊發這一類主題的詩作。而在 1905 年新加坡同盟會成立以後，新馬地區的保皇派就面對來自革命派的挑戰，兩大陣營都有相應的報紙作為宣傳工具，各類報刊的政治取向也愈加明顯。因此，由特定時事感發而成的詠懷詩也沾染了濃厚的黨派氣息。

### 3. 詩歌風格的取向

在報紙充當發表陣地的 19 世紀末期，新馬漢詩的風格不完全取決於作者，

18 黃伯耀：《寓星洲秋日登高有感》其一，《天南新報》，1903 年 10 月 28 日。

19 《國民日報》，1916 年 10 月 15 日。

還受到報紙定位的影響。尤其 20 世紀初以降，新馬地區的華文報紙陸續創設副刊，而副刊的宗旨定位、取材標準以及主編的喜好就會成為影響早期漢詩風格特徵的重要因素。

1905 年 8 月 4 日，《檳城新報》設立了一個名為“益智錄”的副刊，內容涵蓋遊戲文章、告白、雜文、瀛海瑣聞、舊事諧談、笑林、文件、詞苑等，不獨是文學藝術。1907 年 1 月 16 日，《叻報》創設“叻報附張”副刊。主筆葉季允曾撰文略述選文標準、設立本意和實施策略：“蒙莊怪誕，悉屬箴言，曼倩詼諧，都為譎諫。言中有物，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弦外留音，則月露風雲亦堪驚醒。況夫欲正俗者，先求於俗，畢竟村謳里唱，最易感人。善進言者，是知妙句清詞，亦堪風世。”<sup>20</sup>可見，作品不論莊子式的怪誕還是東方朔式的詼諧，皆要言之有物，弦外留音，此為選文標準；期待文章能夠發揮“箴言”、“譎諫”、“正俗”和“風世”之作用，此為副刊創立之目的；而“村謳里唱”和“妙句清詞”則為優先設立的文體，前者即為清末民初流行於廣東地區的方言曲藝形式——“粵謳”，後者即指舊體詩詞。關於此副刊文章風格的定位，次日刊登的兆呂《看看附張出世》有更明確地說明：“附張添設，彙登遊戲之文章，而我輩諧談得以彙陳於報牘。詩詞焉、諧文焉、雜誌焉、粵謳焉，雖非詞嚴義正，而有聞必錄。”<sup>21</sup>

梳理當時這兩大華文報紙副刊的設置內容和緣起，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它們都是綜合性的副刊，刻意強調娛樂性、休閒性和趣味性，以便和相對嚴肅客觀的新聞版面作區隔。實際上，早期報紙副刊，除卻 1931 年《檳城新報》推出的純粹刊登舊體詩詞的“詩詞專號”之外，刊登舊體詩詞的欄目僅佔整個副刊的部分比例，如“叻報附張”副刊就包含叢談、時評、諧談、諧文、來稿和詩詞等多個欄目，僅有“詩詞”欄目登載舊體詩，因此這個欄目也需和其他欄目的總體取向保持一致。如前文提及之“粵謳”，即長期佔據《叻報》、《檳城新報》、《總匯新報》、《中興日報》等報副刊的版面，這種幽默詼諧、通俗易懂、貼切現實的曲藝形式自然會影響到編輯對於同版中舊體詩詞的選擇。受其影

20 葉季允：《叻報附張出世記》，引自陳育崧《南洋第一報人》（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 年），頁 10。因當日《叻報》有所毀損，此文已不見。

21 《叻報》，1907 年 1 月 17 日。

響,早期副刊中登載的唱酬詩、竹枝詞或寫景抒懷詩較多,風格以閒情逸致見長,且偶有遊戲之作。另外,邱菽園、張叔耐、黃鳳翔、曾夢筆等副刊主編自身亦偏好趣味之作,這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當時舊體詩的總體風格。

不過,在那些閒適應酬之作之餘,各大報刊的副刊還是登載了許多充溢南洋風情、真情實感和反映現實的舊體詩作品。1925年以後,伴隨著新文學在新馬報刊中的蓬勃發展,舊體詩詞的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即便如此,主題嚴肅的舊體詩作依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只是在數量上明顯減少。需要說明的是,戰前新馬漢詩書寫數量的多寡受到新文學的影響並不大,更重要的是中國國內在不同時期重大事件的影響。這在李慶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中多有申說,茲不贅述。

## 二、華文報刊與新馬早期“新派詩”

晚清以降,伴隨著國勢衰微和列強入侵,西方科技與文化也隨之進入晚清帝國。此時,中國資產階級已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並領導和發動了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與此同時,為了配合這場政治運動,一場文學革新運動業已釀成。在這場文學革新運動的進程中,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運動發起者相繼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劇改良”等著名的主張,對於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實際上,在夏曾佑、梁啟超等人 1895 年倡導“詩界革命”之前,黃遵憲、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已經開始了傳統詩歌寫作的創新實踐。他們恰當地運用中國傳統的詩歌形式,來描繪和表達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自然流暢,絕無晦澀。這類詩體,黃遵憲自稱為“新派詩”。其特點梁啟超歸納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sup>22</sup>黃遵憲亦在保留傳統詩歌寫法的基礎上,提倡“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用古文家伸

---

<sup>22</sup>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見吳松等,《飲冰室文集》(三)(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827。

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取材方面可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sup>23</sup>

當下學者在解讀新派詩時，多強調其在中國舊文學到新文學轉變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較少深入分析“新派詩”的產生與傳播媒介之間的互動關係。實際上，自 1895 年 8 月起，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就陸續創辦了《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湘學報》、《國聞報》、《湘報》、《新民叢報》等近三十種報紙，宣傳維新思想。當然，上述報紙也為新派詩的發表提供了一個平臺。如在 1902 年至 1904 年間《新民叢報》的“詩界潮音集”專欄就先後刊登了五百餘首新派詩，作者涉及四十多人。而我所理解的傳媒與“新派詩”的關係並不止如此，我更傾向於認為，華文報刊中報道、譯介或評論的西方各類新聞事件或涉及的西方文化恰恰是維新派詩人創作“新派詩”素材的主要來源。在西方傳教士沒有大量到達中國的時候，文人士大夫接觸到西方新事物、新名詞的機會極少；而在晚清西學東漸、近代報刊興起之時，那些能夠第一手接觸到西方科技文化的外交使臣和留學精英畢竟是少數，而大多數“新派詩”作者的世界觀正是通過閱覽報刊獲得的。在這點上，新加坡早期漢詩的作家則更具優勢。畢竟，除卻日佔時期，新加坡自開埠至完全自治之前皆為英屬殖民地，因此西方的政治、科技與文化早在近代報刊興起之前，就很容易被新加坡的知識精英所獲得。當然還有非常有趣的一點，黃遵憲的詩作在晚清帝國被當時的維新份子視為詩界革命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而新加坡早期“新派詩”的產生，也肇始於黃遵憲總領事的積極倡導。

黃遵憲雖然在一生的仕途之中，曾出使過日本、新加坡和歐美等多個國家，然而其詩作中包含的豐富的知識信息並非完全來自於他親身的所見所聞，報紙上的各類信息也是每位讀者構建知識之手段。如他主持圖南社期間，1892 年 10 月的文題之一就是“勸華人多閱新聞紙以擴充見聞”。獲得第一名的王攀桂有明確的闡述：“古無新聞紙，有之自泰西始。泰西之設新聞紙也，一國數千間，或千餘間，或數百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分男女，皆以新聞紙為重，閱

23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黃遵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79。

之使人不出戶庭，周知天下事。我華人皆以經傳子史，文章詩賦爲重，而以新聞紙爲輕；此亦坐井觀天，以管窺豹，難免有膠柱未化之譏也。迄今中國步武西人，知新聞紙無物不有，無事不書，雷厲風行，捷如影響。其長人識見，益人學問，超子史而別開生面。”<sup>24</sup>黃遵憲出此文題即說明他已經關注新聞紙在增長知識方面的作用，而王攀桂折取頭名就更加說明黃遵憲的理念與王氏觀點是一致的。實際上，黃遵憲重視閱覽新聞報道對於擴展知識的正面作用，既暗合當下“媒介就是知識”的理念，也是近代報刊創辦的重要緣起和重要職能。晚清上海的《申報》曾從知識類型上把自己與中國人所習見的諸種傳播做了明確區分：史籍所載，山經地志之紀，雖篇幅浩繁，既博且詳，畢竟是前代遺聞，過往之故事；搜神誌怪，稗官小說，偏多荒誕無稽之言。惟有新聞紙，“紀述當今時事”，“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只要“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sup>25</sup>既然是當今之事，必然會湧現很多新事物、新名詞。概括言之，新馬早期的“新派詩”主要包含三類情形：

### 1. 以時事新聞入詩

新馬早期漢詩作者最常用的方法是，將報刊登載之新近的新聞報道作爲詩作題材，或發表評論，或抒發情感。邱菽園 1940 年有一首寫關於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遇刺身亡的詩：“新國功成感異謀，頻年亡命寄他洲。可憐卒死門徒手，防友難於禦血仇。”<sup>26</sup>托洛斯基是蘇俄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十月革命指揮者、蘇聯紅軍締造者以及第四國際精神領袖，是一名革命家、軍事家、政治理論家和作家。列寧死後他被排擠出蘇共領導核心，後流亡海外，1940 年被斯大林派人刺殺於墨西哥。我們翻閱本地的報紙發現，托氏自從被流亡之後，《南洋商報》就有頗多報道和評論，甚至在 1937 年 2 月就傳出斯大林欲派人至墨西哥行刺托洛斯基的消息。<sup>27</sup> 他會有兩次遇刺的經歷，第一次發生在 1940

24 《星報》，1892 年 11 月 12 日。

25 《本館告白》，《申報》，1872 年 4 月 30 日。

26 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二編，1949 年新加坡刊印本，頁 24 上。

27 《傳史太林派人至墨行刺托洛斯基托氏居宅已戒備》，《南洋商報》，1937 年 2 月 6 日。

年5月25日；第二次遇刺發生在1940年8月20日，次日下午7點35分不治身亡。《南洋商報》8月22日的“晚版”即登載了“托洛斯基昨晚畢命”的綜合報道，並附上托氏的生平簡歷。同時，還特別指出“凶手約翰生本係托氏信徒。”<sup>28</sup>也正因為如此，邱菽園才有後兩句詩中的感歎。稍後，邱菽園又作一首《托洛斯基遺像題跋》，<sup>29</sup>表達對其非正常死亡的惋惜之情。

邱菽園在1901年初還有一首悼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詩歌——《英吉利女君維多利亞輓詞》，顯係得知相關新聞之後所作。實際上，在1901年1月21日的《叻報》電報新聞就有“英皇抱恙”的標題，次日換成“英皇病重”，1月23日登載“英皇崩殂哀電”，證實維多利亞女王於倫敦時間1月22日下午4點逝世。至25日，《叻報》仍在關注本地的各項悼念活動，並稱“坡中人無論士庶、官紳，莫不同懷悲悼。”<sup>30</sup>邱菽園此詩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寫成的，“朝來河上蛟龍會，咫尺雷聲泣雨紛”，<sup>31</sup>貼切地形容出當時人們的悲痛之情。毫無疑問，若沒有報刊對英女王從身體欠安至最終去世的連續報道，很可能就沒有邱菽園的這首悼亡詩了。只是，此詩除詩題外並未用到新名詞，所有意象、典故皆為傳統華族文化所有。

由此可見，用傳統舊體詩的形式完全可以表達當下的時事，甚至是西方國家的時事。類似的詩作還有李俊承的《匯英金響應坡督湯姆斯夫人在英倫呼籲救濟戰時傷難得書電感賦》<sup>32</sup>、陳延謙《閱報載歐美勞工失業數達八百萬感作》<sup>33</sup>、李西浪的《輓羅斯福總統》<sup>34</sup>等。當然，有時一些報章中登載的趣聞也會激發詩人的創作靈感，如李俊承就曾寫過一首《人鼠大戰感詠》，小序中記曰：“報載法國波伊斯蒙農場農民未科突被一大老鼠登肩噬頰，痛極，正擬將鼠叉死，不意草堆中續鑽出大鼠約二百支接應環攻。其他三農民聞聲趕援，持木棍

28 《南洋商報》晚版，1940年8月22日。

29 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二編，頁37上。

30 《哀思未已》，《叻報》，1901年1月25日。

31 邱菽園：《嘯虹生詩鈔》卷二，1922年新加坡自印本，頁3下。

32 李俊承：《覺園集》卷三，1950年新加坡刊印本，頁47。

33 陳延謙：《止園集》（新加坡：南洋印務公司刊印本，1938），頁10上。

34 李西浪：《劫灰集》（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46），頁32上。

草叉與鼠苦戰一小時，乃將鼠驅退，鼠遺屍六十三具，而四農民亦皆遍體鱗傷云。”<sup>35</sup>

## 2. 以科技術語入詩

1890年，黃遵憲在倫敦任駐英使館參贊，以樂府雜曲歌辭《今別離》舊題，分別歌詠了火車、輪船、電報、照相等新事物和東西半球晝夜相反的自然現象。詩人巧妙地將近代出現的新事物，與傳統遊子思婦題材融為一體，以別離之苦寫新事物和科學技術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學技術之昌明，表現出當時人在別離觀上的新認識。與之類似，邱菽園在1937年曾創作了《今遊仙》四首，分別吟詠火星通訊、月窟探險、汽球升高和顯鏡觀物。其中以第一首所詠之事最為新奇：“白光圈子淨皚皚，冰極新將記錄開。無字天書有符號，答詞日盼火星來。”<sup>36</sup>

翻檢本地先前的報紙，《南洋商報》早在1923年10月25日就登載了一篇名為《地球與火星通訊研究》的新聞報道：“英國天文學者之扶司氏在非洲西南部海中坎拿雷島開尼黑夫山上，架設有力望遠鏡窺察火星，研究與火星間通訊之法，乃歷一年，其距離海面八千英尺，於考察最為相宜。近據氏稱，考察結果斷定可有方法與火星通訊。”<sup>37</sup>報道中提出了三種通訊的可能，其一是當地球與火星最為接近時，火星面上直徑達到三十英里的物體，可以於地球表面上望見，若欲看清形狀，則直徑需達一百英里。其二是用無數飛機在樹林上面發出白煙，或在雲氣成積雪上面放出黑煙，面積足夠大時，火星人類即可用望遠鏡見之。其三是用光綫作符號，藉化學方法可以發出極亮之光，每數秒鐘一次，接連不斷，則火星中亦可見之。到1929年底，《南洋商報》從12月4日至18日每天刊登同樣一則來自倫敦的新聞：“由各科學家組織之瑞爾文尼紀念會，將於最近用鎂十噸作一大火炬，施放於瑞士高一萬一千三百尺之少女峰上，試驗與火星人類通訊。名譽發起人勃拉師博士聲稱，施放時將用大返光鏡照於火星上之雪地，則火星之人，必能響應。此時苟有光度極佳之鏡以助眼力，則全球之

35 李俊承：《覺園續集》，1956年新加坡刊印本，頁49。

36 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初編卷六，頁17下。

37 《南洋商報》，1923年10月25日。

人皆可望見。”<sup>38</sup>由此可見，邱菽園詩中描述的情形應該是 1923 年報道中的第三種方法和 1929 年這種方法的結合體。只是由於 19 世紀末天文學家的錯誤觀測，得出了火星上有運河和人類的存在，所以上述方法注定失敗，這也被路透社 1939 年 7 月 28 日的報道所證實。<sup>39</sup> 儘管 1964 年 12 月 28 日美國水手 4 號發射的空間探測器才成功到達火星並向地球發回數據，但不可否認，邱菽園此首詩作也客觀反映了當時世界的科技水平，以及人類向太空不斷探索的精神。

與黃遵憲之《今別離》四首相較，邱氏此組詩有相似之處，皆提及了當時世界的新科技，但《今別離》既是樂府舊題，又反映了“今人”即近代人別離的意識，而邱菽園這類詩作過分拘泥於新事物特性的介紹，傳統詩味略顯不足。另外，島內詩人似乎對於外太空的天文探索尤其感興趣，尚有若干詩作涉及類似的主题。

左秉隆亦有一首講述與彗星有關的詩，名為《庚戌三月赫黎星見，有恐星與地球相觸而世界將終者，作此以曉之》。赫黎星即彗星，作者自注云：“測得此星自赫黎氏始，因以得名。”關於彗星與地球相撞的預測與傳聞由來已久，另因彗星尾巴像掃帚，民間亦稱此星為掃帚星，常與天災人禍相聯接。左氏認為這是杞人憂天，並在詩末回應：“坤輿未為真能毀，且對長星酒滿斟。”<sup>40</sup>左氏為何如此篤定？因為《叻報》在庚戌三月十四亦即西曆 1910 年 4 月 23 日登載了“彗星晨見”這則新聞：“赫黎彗星出沒之日期、時刻、情形，本館早已兩次著論刊登前報。茲悉近來此星經已略見日昨凌晨，船政司署人員曾以單管長柄之千里鏡仰視天空，據言此星由三點鐘出現，至六點鐘止。首向丹戎加東，星尾之光現須用鏡乃見。自茲以往，可以眼望而知之云。”<sup>41</sup>可見，這次在新加坡所見之彗星距離地球尚遠，不會出現觸碰之可能。當然，左秉隆此詩是否為看完這則新聞之後所作，不敢妄下定論。然《叻報》對於彗星出沒的數次報道必然是

38 《南洋商報》，1929 年 12 月 4—18 日。

39 《美國向火星通無線電但已失敗》，《南洋商報》，1939 年 7 月 29 日。

40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卷四（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 年），頁 175。

41 《叻報》：1910 年 4 月 23 日。

左秉隆創作此詩的重要誘因。

類似的詩作還有李俊承的《火星逼近地球感詠》，其小序明言：“《南方晚報》載，曼谷泛亞社電泰國星相家乃乍蘭說，九月七日火星逼近地球，同時冥王星亦出現，因此世上瘋人將日益增加，預兆浩劫將降人間云。”<sup>42</sup>由上述詩作可以看出，普通民衆對於外太空的認知尚處於初級階段，神秘感、不安全感遠大於理性的、科學的解讀。

### 3. 以西方文化入詩

身處大英帝國殖民下的新馬，知識精英們接觸物質層面的西方文化並不困難，而對於精神層面西方文化的認知則主要通過報刊閱覽來獲得，如民主選舉、典章制度、思想理念等。讓我們先看關於進化論方面的例子：大概在 150 年前，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在其《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出了現代生物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這一學說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中葉風靡全球。不過傳入晚清帝國最早的進化論並非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而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捍衛和傳播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進化論。嚴復對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進行翻譯、取舍、評論和改造，1897 年發表了驚世之作——《天演論》，連載於《國聞報》。直到 1919 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才被馬君武首次譯為中文出版。<sup>43</sup> 史實證明，報刊從一開始就是傳播生物進化論的主要媒介。晚清民國創刊的《格致彙編》、《國聞報》、《新青年》等是當時傳播進化論最有影響的幾份期刊。新加坡則有《叻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早期報紙，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仍有不少相關的報道，有正面宣揚，亦有理性辯論。

邱菽園作於 1940 年的《進化吟》，便從時間、自然、宇宙、生命等維度來詮釋他心目中的進化論：“前有萬萬古，後有億兆年。”“人文重進化，後者實勝前。”“世界若巨輪，日日在推遷。”<sup>44</sup> 此詩顯然受到“進化論”和“天演論”的雙重

42 李俊承：《覺園續集》，頁 55。

43 王民：《嚴復“天演”進化論對近代西學的選擇與彙釋》，《東南學術》，2004 年第 3 期，頁 58—66。

44 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二編，頁 7 上。

影響，將進化論的解讀從由早期的生物學擴展至其他領域，同時巧妙融入了佛教的時空和因果觀念於其中。另外，對於西方自由論思想邱菽園亦有詩作：“呷音遠渡太平洋，驚醒獅王睡夢長。”<sup>45</sup>實際上，邱菽園論及西方進化論或自由思想，不獨在中後期的詩歌。他在早年主持《天南新報》和《振南報》期間，就撰寫了一些專論天演論和自由論的文章，如《書天演後論》、《自由篇》等，前者推崇嚴復的譯著有“改鑄我思想，進益我神識”之功能，<sup>46</sup>後者論述西方多位哲人對於自由的觀點。<sup>47</sup>邱菽園還能將“物競天擇”之思想應用於南洋群島各族成敗之評論，直言“處此競存之世界，不勝則敗”，<sup>48</sup>具有鮮明的達爾文主義色彩。

西方國家的選舉文化也是當時的詩人關注的一個議題。當左秉隆第二次擔任駐新加坡領事期間(1907—1910)，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總統大選的消息，於是寫下《聞選定正式總統感而有作》一詩。此詩的創作背景是1908年11月3日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贏得大選正式成為美國第27任總統。此次選舉的消息，新加坡的中英文報紙都有登載，如《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在1908年11月4日就轉載了來自路透社的有關“美國選舉”的電文和報道，內容是“美國共和黨提名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接任西奧多·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sup>49</sup>並且評論了他與民主黨提名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先生的總統競選。華文報紙的反應要略微慢一些，《叻報》在11月6日才援引《海峽時報》的報道，<sup>50</sup>僅翻譯了選舉結果的電文，未設專欄回顧兩個候選人的選舉歷程。左秉隆在這首詩中一方面用兩個典故感歎國內一年來的政治風波：“久矣相桓微管仲，誰歟放甲效阿衡”同時也表達了對於選舉勝出者的期許之情：“莫負元元推戴意，為殫忠悃保

45 邱菽園：《自由鐘》，見於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初編卷五，頁6下。

46 《天南新報》，1902年12月6日。

47 《振南報》，1915年10月26日。

48 邱菽園：《論南洋群島》，《振南報》，1914年6月22日。

49 “American Election”. *The Straits Times*, 4 November 1908.

50 《叻報》，1908年11月6日。

榮名。”<sup>51</sup>

左氏還有一首反映英國婦女要求選舉權的詩作，一方面肯定那些女權主義主張的“共道婦人能議政，不應男子獨登朝”，一方面也在詩下小注中提及了當時政府的態度：“首相班那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對眾婦女云：爾等熱血可嘉，惜予不能不澆冷水數滴耳。”<sup>52</sup>此詩雖作於左秉隆 1905—1906 年遊歷英國期間，但依然可以窺見他對於西方選舉文化的關注，詩句中亦有“平等”、“文明”等新名詞出現。就當時的科技而言，上述信息的獲得，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新聞媒體，而深諳中英文的外交官左秉隆，無需借助翻譯，即可在第一時間了解信息內容。

當然，詩人們除了從報刊中獲取西方的新聞、新科技以及制度文化等，當時已有的科技產品自然也會出現在漢詩之中。邱菽園在 1910—1912 年間就創作了一首《觀銀幕上所演放南洋群島斷片》，<sup>53</sup>這裏的銀幕就是放映傳統投影式電影的白色幕布。由於電影產生於 19 世紀末，有聲電影則晚至 20 世紀 20 年代才發明，因此，電影在 20 世紀初的新加坡應該還是一個新奇的事物，儘管邱菽園當時觀看的是無聲電影。不過，李俊承在 1940 年代創作的《皇宮戲院參觀第二次歐戰影片》就屬於反映有聲電影的作品了。詩中描摹的戰爭場面栩栩如生：“衝鋒驅坦克，縱火擲燒夷。飛將空中降，潛舟水底馳。”好友俞陸雲評曰：“能以新名詞入詩，自是能手。”<sup>54</sup>

總體而言，不論是取材於媒體的新聞報道，還是有感於實際的新事物，新派詩的數量在新加坡早期漢詩領域中所佔比重並不大。但是，這一小部分新派詩的意義卻不容小覷，且和中國本土康、梁之新派詩的功用有所不同。學者夏曉虹曾經這樣評價舊體詩中運用新名詞的影響：“‘新名詞’躋身詩中，正是促使中國舊詩蛻變，白話新詩誕生的催化劑。”<sup>55</sup>顯然，清末民初新派詩的終極

51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卷四，頁 179。

52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卷四，頁 166。

53 邱菽園著，王盛治、邱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初編卷三，第頁 12 下。

54 李俊承：《覺園集》卷三，頁 47。

55 夏曉虹：《詩界十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 年），頁 81。

意義就是實現了詩體語言從文言到白話的根本性改變。當然，古典詩歌的近代化、通俗化以及更貼近當下現實也是詩界革命時期新派詩發揮的重要功能。相較之下，新馬漢詩的歷史很短，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也不存在白話取代文言的急迫性。同時，新馬早期漢詩自發起就和華文報刊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而刊登在大眾傳媒上的詩作必然要求大眾可以看得懂，能和讀者當下的生活或情感相聯接，因此，現實性、通俗性是新馬早期新派詩的共同特點。另外，新派詩通過反映國際時事、現代科技以及西方文化，極大地拓展了舊體詩歌的題材。在田園牧歌、唱和應酬、詠史體物等傳統內容之外，开辟了鮮活別樣的題材類型。儘管囿於絕句或律詩語言的簡潔性，不可能承載過多的新名詞、新事物，但在為數不多的新派詩那裏，傳統漢詩與時俱進的特質已然得到充分地展現。這或許也是傳統漢詩能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儘管白話文運動已經過去一百年了。

### 三、傳媒語境中新馬漢詩價值的發現

1881—1941年新馬華文報刊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新馬漢詩的走向。在此背景下，新馬漢詩的價值呈現自然也不同於中國的傳統舊體詩。就表層意義而言，新馬報刊登載的漢詩起碼具備兩點價值：

其一是保存史料，包括詩歌文獻和歷史文獻。眾所周知，戰前新加坡文壇能夠自費出版個人詩集的寥寥無幾，僅限於邱菽園、陳延謙等富商型文人。大量的詩歌作品散見於新馬早期的報刊之中，包括諸家詩社的月課比賽作品和個人投稿的詩作。尤其是那些非著名作家的詩作，或非作家身份的文學愛好者的零星創作，全憑華文報刊的登載才得以流傳至今。如《叻報》主筆葉季允1903年曾以筆名“笑罕”分別在《天南新報》和《叻報》上共發表23首《星洲竹枝詞》，<sup>56</sup>就沒有收錄在陳育崧為葉季允所整理的詩集《永翁詩存》之中。換言之，新馬華文報刊尤其是副刊的發展演變，就是一部早期華文文學演變的歷

---

56 《天南新報》“詞人妙翰”，1903年7月29日，共4首；《叻報》“詩章摘錄”，1903年8月1日，共8首；《叻報》，1903年8月3日，共11首。

史,涵括新、舊文學,舊體詩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早期新加坡漢詩一定要和華文報章聯繫起來。華文報刊在保留絕大多數漢詩的同時,也通過這些作品記錄下了晚清至二戰結束期間的重大歷史事件,如甲午戰爭、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等;當時身為華僑的新加坡文人非常關注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他們的詩作也忠實地記錄下他們在獲悉上述事件後的所思所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詩歌也可稱為“詩史”。且這部分的事實描述和情感抒發並非出自中國內部,而是遠隔數千里的南洋,就愈發能夠凸顯其詩史的文獻價值。另外,在 20 世紀 30 年代之後,馬來亞教育體系和文化趨向逐漸宣揚“馬來亞化”,<sup>57</sup>但是每次中國的重大事件發生,華僑的愛國熱情高漲,在地化的進程就會被迫延緩,由此也可以得出另外一個結論,華僑文人書寫這些和中國有關的歷史事件的詩作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寫作者身份認同的糾結。因此,那些詩作既是反映時事的詩史,也是作家情感認同的心靈史。

其二是保存詩歌原貌。一個經典的作品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打磨的過程。很多創作者都有過這樣的體驗:創作完一首詩作,相隔一段時間之後,那個作品或者未發表,或者已經發表,作者都覺得某些地方有修改潤色的必要。在常規情況下,作家的這種修改過程我們無從發現。不過如果詩人的作品起初已經發表在報刊上,而其後編訂個人詩集時卻做過變動,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兩份文本的比較中窺見那首詩作的原貌以及作者的修正歷程。如釋瑞于《消夏》發表在 1925 年《叻報》上的詩句為:“椰林海色漫潮聲,十里煙波一棹輕。低語榜人雙槳緩,綠蔭傍岸午風清。”<sup>58</sup>而在其 1939 刊刻的《瑞于上人詩集》中,則是:“椰林海色漫潮聲,十里煙波一棹輕。吩咐榜人雙槳緩,綠蔭低處午風清。”<sup>59</sup>前兩句沒有更動,而後兩句皆有微調。若從修改結果來追溯其修改動機,應該不是格律的問題,而是避免兩句中“榜”、“傍”同音而造成的不協調。

57 參看崔貴強:《從“中國化”走向“馬來亞化”:新加坡華文教科書的嬗變(1946—1965)》,見於葉鐘玲、黃佟葆:《新馬印華校教科書發展回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2005),頁 67—90。

58 《叻報》,1925 年 5 月 14 日。

59 釋瑞于:《瑞于上人詩集》(新加坡:刊印本,1939),頁 10 下。

另外,有的詩人不太滿意早期的作品,在後期出版詩集時經常會出現刪減的情況。實際上,前面提及的釋瑞于在報章登載的《消夏》詩原本有四首,而在出版個人詩集時僅錄其中的第一首。黃遵憲的《新嫁娘五十首》也未收錄在其《人境廬詩草》中。這組作品最早收錄於何幼端輯錄的《閨詞三百首》,而這個《閨詞三百首》就是“總匯報副刊”1934年以書頁式刊印的集子。若將這個版本的《新嫁娘詩》與其後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的《人境廬集外詩輯》相比較,詩句上尚有不少出入。因此,早期報章登載的舊體詩,幫助我們還原詩作在起初發表時的樣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詩作的修改演變中窺探出詩人的寫作技巧和創作偏好。

事實上,早期華文報刊對於新馬漢詩發展的貢獻不僅僅局限於提供傳播渠道和保存原始史料。這些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我看來,更為深層的價值在於詩人的創作成果從“私人領域”進入了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公共領域”,作家的詩歌“文本”也最終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呈現。這裏涉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和“文本”與“作品”兩組概念。先談公共領域。這個譯自德語 *Öffentlichkeit* 的術語包含了多種意義,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雖然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絡,但毫無疑問他的論述側重於政治公共領域,尤其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sup>60</sup> 因此,我更願意採用奧斯卡·內格特(Oskar Negt)和亞歷山大·克魯格(Alexander Kluge)的觀點:“公共領域意指特定的機構、中介、實踐;然而,它也是一種一般的社會經驗範圍,其中所有實際上或表面上對所有的社會成員相關的事情形成一個整體。在某種意義上來理解,公共領域一方面是為一些專業人士(如政客、編輯、組織官員)提供的一個場所,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涉及每一個人,僅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們的意識範圍內才能理解的東西。”<sup>61</sup>

60 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61 Oskar Negt and Alexander Kluge,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translated by Peter Labanyi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 1-2.

將這個定義沿用至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也就能夠理解為,報刊作為一個公共領域,既可以充當作家或主筆發表作品或評論的一個平臺,同時也可利用發表的文本向讀者、公衆傳達一些帶有個體傾向性的東西。這也意味著,公共領域聯接著信息發布者和信息接受者兩端,這一方面符合當下文學生產、傳播和消費的觀點,一方面也和哈貝馬斯的觀點吻合:他也認為公共領域需要“特定的方式來傳遞信息和影響接受者”。<sup>62</sup>

下面再看“文本”到“作品”的轉換。這是和上一組概念密切相關的術語。對於文本,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它是文學作品的表面現象;它是在作品中的詞語交織形成的紡織物,它的組織是為了盡可能確定獨一無二的穩定的意義。”<sup>63</sup>但這種意義價值的維護和呈現只是物質性和部分性的,放置於不同的時代、讀者或一系列制度裏,文學的最終價值依然是以“作品”的方式呈現的。因為作品才是精神性的,開放性的。如果說文本意味著書面上的文字,那麼作品就意味著文字之上的意義和價值,當某一個書寫的產物被稱為“作品”的時候,也就意味它有某種超出文字本身的東西獲得了承認,正是這種東西讓人們把它稱為“文學作品”。在報刊出現之前的新馬文壇,由於極少自刻詩集,舊體詩的傳播僅限於面對面的文人雅集和書信往還的人際唱酬,輻射面極其狹窄。正是在報刊出現以後,大量舊體詩進入了讀者的閱讀視野,也經由編輯、主筆或評論者一定程度的修正和解讀體現出詩作的精神價值。<sup>64</sup>

在早期的新華舊體詩壇,這種作品的精神價值大概可歸為三大類別:審美欣賞、文化再現和社會政治參與。而在此過程中,報章媒介皆扮演了十分重要

---

62 Jürge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Stephen E.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136.

63 錢翰:《從作品到文本——對“文本”概念的梳理》,《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頁38。

64 此處使用之“精神價值”,取自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關於價值等級分類的第三個層次,意指可以區分出美與醜的美學價值,正確與錯誤的價值,以及以其自身為目的的純粹知識的價值。可參閱馬克斯·舍勒著,倪梁康譯:《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的角色。

其一是面向大眾的文學審美價值。第一代南來詩人對於星洲自然風光的描繪、個人思鄉念家情緒的抒發以及與友朋、情人迎來送往的敘寫都可以用創作和發表舊體詩的形式來承載，而所有這些皆屬於個人的所見所聞或私領域的情感宣泄，將之公諸於世並無特定的功利性，更多地是向讀者傳達一種文學性的審美價值。這一點，哈貝馬斯所稱的“文學公共領域”則與之有類似之處。儘管他的本意是利用有教養的一群人在報刊和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所的個人發表來抗衡政治性很強的宮廷文化，他也認為閱讀是作為進入公共領域前的準備，藉由閱讀文學作品，人們能夠讓源自家庭內在領域中與公眾密切相關的主體性的私人經驗與閱讀內容對話，隨後將這些對話的成果帶到文學公共領域中與他人分享、討論。<sup>65</sup> 固然，早期南來詩人筆下的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自然風光、物產和人情具有個體性，不同詩人對於同樣事物的書寫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大量此類的詩作通過報刊登載進入公共閱讀空間之後，一般讀者還是可以獲得較為合理的認知。對於那些差異性的部分，讀者可能會解讀為詩人的藝術個性和詩作的獨特風格。而那些抒發個人情感的詩作若積累到一定的數量，就會影響到每一個讀者的情緒，進而形成一個社群、區域或社會的共同情感傾向。舉幾首中秋月夜感懷詩：

1. 無情明月惹鄉心，客思無聊放浪吟。最是傷懷弦管處，教人煩惱總難禁。<sup>66</sup>
2. 樽前曲唱念家山，萬里羈人未得還。為問海天今夜月，可能長照酒杯間。<sup>67</sup>
3. 痛苦空山最上頭，團圓明月負中秋。紅塵托足應無地，落葉飄零

65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p. 49.

66 陳元光：《中秋月感六首》其五，《檳城新報》，1917年10月8日。

67 寧鏡瀾：《和黎君耀聰中秋雜感》，《益群報》，1921年11月7日。

冷九州。<sup>68</sup>

上述詩作在發表之前,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那些思鄉愛國的情感是這個詩人羈旅異域的個人體驗,並不一定代表大眾的共同意識;然而類似主題和情感傾向的詩作發表之後,普通讀者的情緒會受到感染。而在形成一種集體意識之後,又會激發更多的詩人來創作此類詩作。至此,詩作的審美價值也不再是百分之百的無功利了。但是毫無疑問地,偏向文學性的詩作從無功利性到功利性,通過媒介發表進入公共領域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其二是多元文化的文學再現。自開埠以來,新加坡就是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匯聚地。儘管生活在其間的民衆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囿於教育水平的低下,他們對於多元文化的認知僅僅停留在各自不同的膚色、語言和生活方式等外在形式的東西。實際上,在這個小島上,文化的多樣性、複雜性遠超過一般學者的想象。即便同為華族民衆,福建人、潮汕人、廣東人、客家人或海南人在很多文化上又有所差異。而至於種族和諧、文化包容、相互尊重和平等對待等核心理念則依賴於政府機構和平面媒介的宣傳。就報章而言,社論與相關主題的新聞報道是其中一個重要渠道,而副刊的文藝版面同樣具備這樣的功能,只是前者是顯性的、說教式的,後者是隱性的、詩意的。最能體現南洋華洋(或華人與土著)雜處、文化多元的詩作非竹枝詞莫屬。李慶年曾搜羅馬來亞早期 17 種華文報紙中的 4197 首竹枝詞結集出版,<sup>69</sup>若干首《星洲竹枝詞》記錄了新加坡多民族雜處形成的混雜文化,以及維護各民族傳統的節日文化;《馬六甲竹枝詞》、《怡保竹枝詞》、《柔佛竹枝》等記錄了馬來亞半島除卻新加坡以外的民間文化;此外,《越南竹枝詞》描繪了越南的民間習俗,《山口洋竹枝詞》細膩地刻畫了婆羅洲土著的生活習慣;《荷屬各地雜詠》、《菲律賓納卯新年竹枝詞》,描寫南洋各地華僑慶祝新年的狀況;《仰光旅次南遊雜感》、《暹南紀遊》,描述緬甸和暹羅的自然風光和民俗人情。可以想象,若沒有當時新馬地

68 黃白:《月夜雜感並悲國事蝸蟪九首》其三,《南洋商報》,1926年7月3日。

69 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區的華文報章,如此豐富多元的文化景觀就無法通過文學再現進入到普通讀者的視野。而衆多作者在連篇累牘的這些竹枝詞中對待多元文化的態度,除了極少數人有隱性的歧視之外,基本都持新奇和尊重的態度,畢竟在發表的過程中,還要通過副刊編輯的審閱。而這樣的發表和閱讀行爲,顯然可以幫助民衆對於在地多元文化的認知以及了解彼此尊重的重要性。

當然,報刊所載之新華舊體詩在反映不同特質的文化上還是有所側重的。對於馬來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再現,多集中於外在形式的、異於華族文化的方面,如服飾、飲食、節日、民俗等。而對於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對比的部份,詩人們則常能觸及到一些現實的、深層的問題。比如華人知識群體在報章上的詩歌唱酬,就是一種帶有鮮明華族特色的交際文化,也是對“詩可以群”觀念的繼承與發揚。詩歌的唱酬贈答形式多樣,範圍廣泛。可以是在地文人或流寓文人內部的唱和,也可以是在地文人與流寓文人之間的唱和,還可以是文人與非文人(政治家、專業人士、企業家、社會名流等)的交際,寓居新加坡的文人與東南亞其他地區文人的互動。當然,諸種人士間的唱和並不一定會產生社團,但是憑借報刊這個媒介,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寫作者無形中形成了一個松散式的文化圈。當然,有一些詩作深入剖析了中華文化中的劣根性。如蕭雅堂曾作過五首《番客婦吟》,寫中國沿海地區的貪財之人,將女兒嫁給到南洋謀生的老番客,番客之婦苦盼家鄉而不得歸的淒涼境遇。這個反映現實的組詩充分揭示出華族婚姻文化中重財薄情之劣根性。時人也給予高度評價:“以文言道俗情,悱惻動人之處,令人有拋離家室、不如歸去之思,較之唐詩‘悔教夫婿覓封侯’一首尤爲真摯。”<sup>70</sup>此外,反映多元文化的詩作也會涉及跨文化的議題,包括中外文化比較和區域文化比較,在此不再贅述。

其三是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活動。作為早期寓居南洋的華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祖國的命運;而身處英國殖民統治的新加坡,早期知識分子也會在報章上發表詩作來揭示華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喚起廣大僑民的共鳴。因此,早期的華文報刊除了營造文學和文化的公共空間之外,還為知識群體與閱讀

---

70 《天南新報》,1899年1月19日。

者搭建了一個討論社會與政治議題的公共領域。

先看涉及中國時政的部分。從1891年10月至1894年12月《叻報》及《星報》上登載的“圖南社”課榜名錄來看,文的部分大多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僑務等議題,而詩的部分則顯得一如既往的遠離政治。不過,在1894年10月的課題中,就出現了一首以時政、軍事為題材背景的詩題:“六月廿六日小島海戰,廣乙以小兵輪敵三倭艦船,林國祥勇銳莫當,檳榔嶼人也,作詩紀之。”<sup>71</sup>甲午戰敗以後,《星報》刊登了署名“龔川舊客”的《時事有感》數首,慨歎“盛京未盛城多陷,威海不威艦半沈。”<sup>72</sup>此後,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國共紛爭、抗日戰爭等中國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皆有若干舊體詩作反映。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同盟會為了和保皇派爭奪輿論高地,在1905年成立前後陸續創辦了《圖南日報》、《南洋總匯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等報紙作為宣傳革命的工具。儘管上述報館的控制權更動頻繁,但是同盟會成員或傾向革命派的編輯、作家宣傳革命、鼓動民衆的熱情卻非常高漲。1907年7月,光復會領袖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被殺,同盟會會員亦在紹興被殺,消息傳至南洋後,剛創刊一個月的《中興日報》便在其副刊刊登了悼念二位的詩作,表達悲憤與傷悼之情。“酸風一夜刮皖水,頓使錢塘冷氣增。大地山河久破碎,高堂棟梁方折崩。女媧赤地施修補,孺子俯躬待犬鷹。聞道爰書莫須有,魂沈海底冤層層。”<sup>73</sup>徐、秋逝世一周年後,《中興日報》又陸續刊載了紀念兩位的詩作,如陳奠邦《八打威周年追祭徐錫麟先生》:“為念深仇不戴天,捐軀雪恥復中原。吾僑未撫徐君劍,幾度臨風倍愴然!”<sup>74</sup>仙悟《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韻》其一:“秋風秋雨冷黃昏,一卷遺詩有淚痕。我賦《大招》填怨海,香魂不吊吊國魂。”<sup>75</sup>

再看關注本地時政的詩作。晚清駐新加坡的幾任領事中,左秉隆的性格

71 葉鐘鈴:《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2年),頁75。

72 《星報》,1895年4月3日。

73 少蘭:《浙禍》,《中興日報》,1907年8月20日。

74 《中興日報》,1908年8月10日。

75 《中興日報》,1908年8月17日。

過於溫和謹慎，加之殖民政府對於華僑華工言論採取強壓政策，因此他在報章上發表的詩作對於本地時政鮮有提及；黃遵憲主持圖南社期間，關注華僑命運，所擬文題有不少涉及當時時政，但他自己的詩作從未在本地報刊發表，因而在爭取華僑權益方面的貢獻表現在實務上，而非詩文宣導。楊雲史則有長篇七言古風《哀南溟》，將明清四五百年華僑祖先開辟南洋諸島之史實，皆摘要薈萃於作品之中，而對其淪為西方殖民地以致先人功績湮沒而哀歎不已。該詩收錄於楊雲史 1926 年出版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中，1939 年載於香港《民鋒》雜誌第 1 卷第 3 期，這是一份中華民國專門面向海外華僑讀者的半月刊，新加坡讀者很容易得到。<sup>76</sup>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南侵，狂轟濫炸，華僑四散逃難，華文報章全部停辦。光復之後不久，筆名為“浩劫餘生”的謝松山以其飽醮血淚之筆，寫下近百首《昭南竹枝詞》，連載於《南僑日報》，淋漓盡致地揭露日寇的法西斯罪行，引起強烈反響。

一般而言，時政話題經常出現在報刊的新聞版，直接報道或評論當前國際國內局勢，以及與國家社會政治有關的議題。此類新聞報道貴在信息源的可信，報道時間的迅速以及相關評論的客觀，而副刊版登載的文學作品，即使題材內容涉及社會政治，但在表達方式和情感效應上與新聞報道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側重於對已發事件的事實評述；後者則強調文人對於這一事件的情感態度。同樣一個事件，經由兩種不同文體呈現在同一份報刊上，自然會給讀者帶來不同的接受體驗，也可彌補新聞報道中容易忽略的細節。正如謝松山在劫後（1945 年 11 月）所云：“不佞居此三年，耳聞目見，實難計數。因其事之不傳也，恐日久遺忘，爰效古人，以竹枝詞之體，筆而記之，成數十章，以一詩記一事，而繫之說明，及今觀之，雖屬明日黃花，不能作為一種信史，然思以往之恐怖，念今日之幸生，不妨留為茶餘飯後之談，俾後之人知，在日寇統治下之所謂昭南市民，如何渡此三年餘之悲慘生活。”<sup>77</sup>

76 參看《南洋商報》晚版，1939 年 9 月 7 日。

77 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竹枝詞自序》，載於《南洋商報》“和平副刊”，1946 年 6 月 6 日。其自序署寫作時間為“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父誕辰”，即 1945 年 11 月 12 日。

總之,華文報刊的出現,使得先前只能小眾傳播的新馬漢詩走上了公共傳播的平臺,進入了讀者大眾的視野。更為重要的是,一旦那些詩作經由報刊登載之後,其作品的審美價值、文化再現或社會政治參與都會盡可能的展現,進而影響到大眾的閱讀認知和情感體驗。

(作者: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M. H. 艾布拉姆斯著, 鄺稚牛等譯: 《鏡與燈: 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 方桂香: 《新加坡華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研究》, 新加坡: 創意圈出版社, 2010 年。
- 左秉隆: 《勤勉堂詩鈔》, 新加坡: 南洋歷史研究會, 1959 年。
- 李西浪: 《劫灰集》, 香港: 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1946 年。
- 李俊承: 《覺園集》, 新加坡: 刊印本, 1950 年。
- 李俊承: 《覺園續集》, 新加坡: 刊印本, 1956 年。
- 李慶年: 《南洋竹枝詞彙編》, 新加坡: 今古書畫店, 2012 年。
- 李慶年: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邱菽園: 《五百石洞天揮塵》, 廣州: 邱氏刊印本, 1899 年。
- 邱菽園: 《嘯虹生詩鈔》, 新加坡: 自印本, 1922 年。
- 邱菽園著, 王盛治、邱鳴權編: 《丘菽園居士詩集》, 新加坡: 刊印本, 1949 年。
- 夏曉虹: 《詩界十記》,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1 年。
- 陳平原、山口守: 《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年。
- 陳延謙: 《止園集》, 新加坡: 南洋印務公司刊印本, 1938 年。
- 黃遵憲著, 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 《黃遵憲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楊松年、周維介: 《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 1927—1930》,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1980 年。
- 葉鐘鈴: 《黃遵憲與南洋文學》, 新加坡: 亞洲研究學會, 2002 年。
- 劉若愚著, 杜國清譯: 《中國文學理論》,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 釋瑞于: 《瑞于上人詩集》, 新加坡: 刊印本, 1939 年。
-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Jürge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Stephen E.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Oskar Negt and Alexander Kluge.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translated by Peter Labanyi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二、論文

王民：《嚴復“天演”進化論對近代西學的選擇與彙釋》，《東南學術》，2004年第3期，頁58—66。

李志：《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學術研究》，2002年第10期，頁109。

崔貴強：《從“中國化”走向“馬來亞化”：新加坡華文教科書的嬗變(1946—1965)》，見於葉鍾玲、黃佟葆：《新馬印華校教科書發展回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2005年。

梁啟超：《中國各報存佚表》，《清議報》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見吳松等：《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葉季允：《叻報附張出世記》，收錄於陳育崧：《南洋第一報人》，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年。

錢翰：《從作品到文本——對“文本”概念的梳理》，《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頁38。

##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re-war Han Poetr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Wang B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350007)

### Abstract

Han poetr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did not enter the sphere of the general public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Malaya's first newspaper, *Lat Pau*, in 1881. In the 60 years of its publication history, from 1881 to late 1941 before the downfall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Lat Pau* witnessed a rapid, robu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s. Following this were the respective debuts of more than 20 newspapers, such as *Penang Sin Poe*, *Sing Po*, *Thien Nan Shin Pao*, *Jit Shin Pao*, *Union Times*, *Chong Shing Yit Pao*, *Nanyang Siang Pau*, and *Sin Chew Jit Poh*. These newspapers became important for the circul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as some of them published poems on a periodic basis and some daily. Therefore, the status of Chinese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editors wer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Han poetry. Meanwhile, the "new-style poetry" that emerged at this time may be seen as products of Chinese newspapers published at this time. Furthermore,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sh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modern newspapers lies not only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riginal material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brought the poets' creative works from a "private sphere" to the "public space," and thereby conveyed to the reader the value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Han poetry; Chinese newspapers; Singapore and Malaya; public space; new style poetry